

唐代阶层研究中的社会学叙事

张琛 狄歌

唐代阶层体系的社会学建构

“阶级”一词是舶来品，在拉丁文的语境中，多指古罗马的财产分配、教会组织及植物分类等。17世纪以后，则与权威、教育发生联系，社会层面的含义开始凸显，多指具有社会经济差异的社会群体。

现代意义上的阶级，已经衍生出多重含义，不少学者依据冲突理论，把政治权力或经济关系作为标准予以划分与建构，凸显其与政治斗争、政治革命、意识形态革命的联系。也有学者尝试以多元标准来划分阶级，即将社会学理论引入群体区分中，关注群体意识、阶级认同和文化表现。

马克思·韦伯和埃米尔·涂尔干的分层理论是其重要代表，前者主张经济、声誉、权力同样具有分层属性；后者认为社会分化和分工是合理的，各群体组成相互联系的系统也是社会发展的平衡力量。

社会分层理论适应了唐代社会的复杂性，为重新构建唐代社会阶层的结构提供了基础。为此，突破传统的法律视角，以多维度审视阶层的划分，成为唐代阶级研究的发展趋向。

《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》以官职、门第、财富为标准，重新构建唐代阶层体系。官职对应的是权力，门第对应的是文化，财富对应的是经济，三者互相倚用，又有侧重。

其中，权力属第1位，文化属第2位，经济属第3位，以权力为主导，文化为辅助、经济为补充，将阶层划分为官员阶层、士族阶层、商贾阶层、农民阶层、贱口阶层5类，各类又分不同子类，共计19种。

在此基础上，寻求阶层体系建设的突破，即建构了一个以官员阶层为主导，士族阶层、商贾阶层为辅助，农民阶层为基础，贱口阶层供服务的社会系统，关注系统内部的联系、发展与动态变化。

唐代阶层流动图景的社会学书写

阶层跨越在社会学领域往往称之为社会流动，个人或群体实现的社会地位或阶级变化均属于此，有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等不同形式，前者是指在同一层面上的横向变化，后者则指不同层面上的上下流动。

唐代社会流动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科举制度的影响，潘光旦、费孝通、钱穆、吴宗国、傅璇琮、任爽等关注到科举对于文人士向上流动

的意义，并强调科举是士人阶层的出现并凝固的重要推手。

科举之外，张天虹以河朔藩镇为案例，探讨军事才干与文化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效用，无疑是社会流动渠道研究的新突破。在此基础上，该书在其它渠道上进行开拓，所涉范围甚广，包括门荫、荐举、辟署、军功、流外、伎艺、纳资等。

其中，科举、门荫、荐举、辟署、纳资、流外容易被高官与士族及商贾群体控制，进而发展成以血缘、门生、故吏、亲友相为倚用的特权仕宦阶层。而军功与伎艺对农民、太常音声人、杂户、官户、工乐户、隨身、部曲、官私奴婢等向上流动有利。

众所周知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使得各类人群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，贵贱轮回慢，社会结构简单，统治阶层扁平化趋势尤显。相反，开放的社会风气，急剧的社会变革，动荡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流动的加速，造就了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阶层流动的不同特点。

该书显然关注到了这一点，分武德至永徽，显庆至天宝，至德至大中，咸通至天祐5个阶段进行探讨，在总结各阶层社会流动的基础上，将其归于特权阶层的形成、发展、衰落和消亡。如果说，关注各阶层的不同流动形式和流动渠道属于空间研究范畴，那么探讨各阶层在不同时期的流动特点则为时间研究范畴。二者结合，可还原唐代阶层社会流动的动态图景。

特色阶层社会流动的社会史关照

根据不同划分标准，唐代阶层可分为多种类型。诚如前论，按照社会分层理论大致划分为官员阶层、士族阶层、商贾阶层、农民阶层、贱口阶层5类，又细分为若干子类，其中农民阶层和商贾阶层的流动颇具特色。

就农民阶层而言，多据冲突理论来审视这一阶层的地位，葛金芳、张泽咸、张安福、张国刚等关注到农民阶级内部的构成及其阶层分化，为农民的社会流动研究提供参考。

该书独辟蹊径，将参军视为农民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。

武德时期因战争需要，贫民很快在政治经济上实现了向上流动，有些人还步入了高官行列，统治者在策略上也使得这一阶层向上流动的宽度和速度不断增强。

贞观至显庆五年(660年)，府兵的消费数额不断攀升，进而成为中产家庭的重要负担，好在

有身粮的发放，勋田和官职的赐授，得远大于出，参军仍是中产以上农民向上流动的途径。

显庆六年(661年)至开元二十五年(737年)，兵募始兴，中产以上农民视参军为畏途，月赐不仅得不到保障，死于王事者也是无人问津，中产农民和贫民参军难免会向下流动。

开元二十五年后，唐代职业军人体系的建立，对中产以上农民和贫民的虹吸效应截然不同，前者为避免向下流动会逃避军役，后者会借此向上流动摆脱生活的困顿。

就商贾阶层而言，杨德泉、肖建乐、宁欣等关注到市民阶层的形成与分化，并尝试研究其社会流动。在此基础上，该书将商贾阶层分为商贾群体和小商人群体，全方位研究其社会流动。

显庆至开元时期，商贾群体多以纳资进入仕途，也有花钱度为僧道实现向上流动。

至德至大中期，受战乱影响，财政疲弱，商贾纳资入仕再兴，还出现纳资减额，纳资入军籍的情况。纳资之外，科举、门荫、军功也向商贾群体敞开怀抱，这一群体向上流动途径呈现多元化趋势。

这一群体在市民阶层中扮演了社会领袖的角色，可视为特权阶层的一级，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起到重要作用。

当然，该书尚有待提高之处，墓志资料鲜少运用，这与近年来墓志资料的规模性出土与研究并不同步，唐代特权阶层与社会流动的历史地位也可再丰富。

《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》孙俊著 人民出版社

■西安长安塔 许双福 摄影



书中别开生面地描写了苏东坡苦读各种典籍的动人故事，他的文学作品和书法绘画成为历代诵读、青楼的藏品，尤其诗词文赋至今是宋代文学的高峰。贬居黄州写下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和《后赤壁赋》，可以视为苏东坡提升、革新了宋词，宋词造就、托举了苏东坡。

我们从书中看到，苏东坡得名于诗词，亦遭祸于诗词。因诗词文赋于进士考试中大放异彩，而步入仕途；又因小人、佞臣拿他的诗词发难，诬陷、打压、罢官而九死一生，多次入狱、贬逐和流放。

然而，苏东坡信心笃定，寄望于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对明天充满美好憧憬与期待。全书多处写了苏东坡这种积极向上、乐观坚韧、纯真高雅的文学情趣和人文情怀，也像春风鼓荡着他在文坛、仕途中，一次次声名鹊起。

人人都爱苏东坡，对于弘扬中华古典文化，滋润读者的人文修养，激发民族复兴有着积极意义。基于这一目的，作家写出苏东坡的多重之美：恒持苦学，学以致用；为官担当，抗洪除疫；诗词文赋，琴棋书画，多有精通，表现出文艺全才的深邃之美。

这是人人都爱苏东坡的理由所在，价值所在，追求所在。该书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宽视域描绘，构筑起如“清水出芙蓉”般的不同于其他苏东坡传的新的美学坐标。

《人人都爱苏东坡》孙建勇 著 长江出版社

点读

《屠海》，生态警钟的经典之作

李钊

加拿大作家法利·莫厄特，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家。他带着对自然世界的热爱和强烈的生态意识，以赤诚之心书写《鲸之殇》《屠海》等洋溢着生态意识，并对人类行为和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，几度掀起世界范围内生态保护的热潮。

《屠海》是一部记录人类肆虐海洋生命的报告文学，详尽记录了16世纪西方人踏足北美洲之后的500年间，沿科德角至拉布拉多北美大西洋海岸线一带，海陆动物大幅减少甚至灭绝的情况。

原本这里是海洋生物的乐园，鱼、鲸、野牛、海豹、海象等不计其数的海陆生物在此栖息繁衍，而因环境污染、人类战争、盗捕滥猎、消遣运动、渔业政策等因素，无数海陆动物遭受灭绝或濒危的命运。

即便该书已出版多年，书中超越对破坏生态行为表象，深入最本质的伦理深层次的批判，一如以往地提醒人们，应当如何与自然相处。

追寻莫厄特的创作足迹，他绝不是那种“呆在屋子里研究动物尸体的学者，而是一个到荒原里去考察的实际工作者”。《鲸之殇》写了他亲身经历的一头怀孕母鲸的悲惨故事，讲述一段人类屠戮鲸类的血腥历史；《鹿之民》是以他在哈德逊湾西部荒原地带的旅行为基础，完整记录一个古老族群的消亡过程；《与狼共度》则记录着狼群生活的细节，写就一段人狼传奇故事；而《屠海》则以其的所见所思，逼视人类的残酷与自身伦理的狭隘，以及可能造成的生态恶果。

1945年，24岁的他走出战争，乘船返家途中，目睹了自在喷水的抹香鲸，结伴而游的蓝鲸和瓶鼻鲸，无边无际的海鸟，还有剑鱼、巨型水母、姥鲨等稀奇古怪的动物，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，他见到海豹猎人的血腥屠杀，感知海豹、海鸟、龙虾、海獭等动物数量的明显下降。

带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使命感，莫厄特深入野外，发现“并不只是大西洋沿海地区动物的消亡状况让人难以接受”，而据世界各地博物学家和科学家的报告，除人类以外，“其他动物的减少几乎是普遍性问题，其中许多动物正在加速减少”。

他一路行走、追寻和反思，用作品呈现大地、海洋以及加拿大北部荒原上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，唤起了人们对环境破坏、野生动物受虐和原住民所处困境的关注，字里行间充满强烈的生态意识和人道主义关怀。

“在我们的时代，生命正在消失”，莫厄特在《屠海》后记中如此开发利。人类的生存固然离不开对大自然的开发利用，但代价不应是对生物链的破坏，更不应引至物种的消亡。

大海雀、极北杓鹬、旅鸽等已经灭绝，一些鲸种已不复存在，海象、北极熊、美洲狮等被夺去生命，曾经丰富得令人类难以置信的种群，一个接一个减少乃至濒临灭绝。

当然，如黑背海鸥、三趾鸥等野生动物，数量骤减后明显恢复，可这种数量的增加，却显出黑色幽默的意味。“由于现代渔业对海洋生物大规模地、毫无节制地破坏，因此产生了过量的内脏和腐肉供它们食用。此外，海鸟在人类倾倒入海洋的大量垃圾中，也找到了不少食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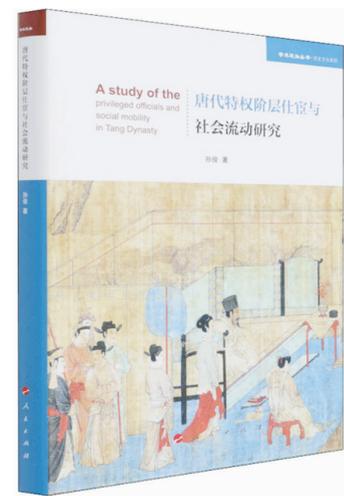
最值得反思、最令人悲哀的，是有些捕猎者不愿承认，甚至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恶。近50年，全球野生动植物减少2/3，曾存活过的10亿到40亿种动植物和菌类，现在仅存2000万种。

海陆生物数量的锐减，正改变着生物多样性的有序结构，人与自然的平衡被破坏，并最终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。不禁在想，保护海陆动物的多样性，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，千万别等到真正的末日来临，我们才意识到，曾经明明有机会拯救这个地球。

《屠海》警示我们，生态和生存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，只有在发展中保护、在保护中发展，人类才能永远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土地上。

《屠海——北美生物灭绝档案(16世纪至20世纪)》[加]法利·莫厄特 著 高见 刘莹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深读



唐代阶层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，早在20世纪20年代，日本学者玉井是博、宇都宫清吉对唐代阶级结构的考察，开启了这一新的研究主题。

中国大陆对唐代阶级的研究，主要集中于阶层的划分及其政治影响。

20世纪三十年代，黄现璠、陈寅恪等以群体自身特性与职业为标准，对阶级进行区分；在此基础上，探究不同类别的统治集团之间的演变与斗争。

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，侯外庐、韩国馨、胡如雷等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，对唐代阶层进行划分；在此基础上，考察不同阶层的运行生态及政治地位。

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李伯重、李晓路、冯尔康、徐庭云、张泽咸、宁欣等尝试吸收西方社会学理论，以政治特权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，并关注阶层的社会生活与身份改变。

顺应这一发展趋势，《唐代特权阶层仕宦与社会流动研究》再次完成唐代阶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，在吸纳新的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，在唐代阶层划分、特权阶层的定义、社会流动渠道的探研、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流动对仕宦阶层的拉动等方面，完成了这一课题研究的 sociology 叙事，在相关研究中尚属首次。

到过一条街道，人烟烟火升腾，美食饰品充盈，一片繁华。初去，图个新鲜，再去就觉得人山人海，眼花缭乱。但这回是东道主，请初次到访的朋友去游逛，倒是个好地方。不曾想，竟寻见一家“遗忘书店”。

快到这街的尽头，准备转身，朋友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就陪我走完这条街。”我知道后边没什么可看，也没什么店铺，就漫不经心地带着他走着。倏然，他扯着我的衣角说：“快看，一家书店！”

我的整个人都被他拽过去，“遗忘书店”几个遒劲的行书大字映入视线。他转而被门两旁的实木书架给吸引走了，我凑近一看，有《知音》《读者》《特别关注》《火花》《环球地理》等杂志，上面还昭然写着“过刊杂志1元一本”。我迫不及待想买几本，朋友拦住我说，进书店看看。

轻轻地推开门，一股醇香弥漫全身。一位眉似月长，鼻梁高挺，微胖，嘴角有痣，两鬓斑白的老妇人在柜台前，似曾相识地对我们微笑。我们礼貌地回应，就听着她小嗓招呼另一位和她年纪差不多的老人，我们确信这是她的老伴。

她吩咐老伴，带我们到书屋走了一圈。人不多，但都在阅读，或俯身低头或盘腿席地而坐，也能听到书页翻动的清脆声。遗忘书店不大，多用来摆书了，仅留下两条窄窄的过道。用余光中老先生的话说：“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，一眼望去，卷帙浩繁，颇有书城巍巍的气象”。的确，放眼望去，它的布置和图书馆没什么区别。书多不用说，还有暖光照耀下的阅读区，坐在那里，没人打扰，捧一本书，品一杯香茗，仿佛这世界就是自己的。

我们挑了好几本书，价格都不高。正要付钱时，柜台前的老妇人说：“你们看完了的书，如果不需要了不要扔，我们书店回收……”还没等她的话说完，朋友抢在我前面付钱。争抢间，我看见一面墙上挂着照片，正是这老妇人和几个双瞳剪水的孩子，捧着几本书在阅读。还有一张是她的老伴，在一个农家书屋和几位戴着草帽的农人翻着书……这场景，在我的眼里留下底片，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桓不去。

走出书店，我们又买了几本过刊，时光仅留下书的陈旧味道，看上去还是比较新。回去以后，我拿起一本看，竟然还有我的一篇文章。很庆幸，不仅时光读到了我的文章，还把这篇文章长久地存下来，就像这家遗忘书店一样，永远都不被遗忘。

是的，遗忘书店不会被遗忘。因为它一直都被人牵挂着，不仅有城市里的白领，还有山里的孩子、村里的农民……就像我那篇文章中的一句话：“即使是一粒沙子，还有人牵挂，就不会被遗忘。”

遗忘书店 秦同

心织笔耕

用生命为苏东坡立新传

杨国庆

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”历史上许多人都被“大江东去”而“浪淘尽”，但有一人，却随着“大江东去”而一再显示出艺术才华和人格魅力，被公认为“千古风流人物”——他就是苏轼——苏东坡先生。

宋代至今，人们用各种方式纪念他。2022年12月，作家孙建勇的《人人都爱苏东坡》由长江出版社出版。这是孙建勇用生命和心血，为苏东坡立新传的一部新书。

他数十年如一日研学苏东坡，颇有心得和独见。由于长期伏案，过度劳累，致使心脏冠状动脉血管严重梗塞。做心脏搭桥手术时，心脏曾停止跳动两小时，靠体外生命支持才渡过难关。

他从小就患小儿麻痹症，靠双拐行走，但他无怨无悔，时常远赴苏东坡生活、为官的多个城市和多地遗迹，考察、收集和记录有关资料，终于写成这部热情讴歌苏东坡的新传。

“若无新变，不能称雄”。该书的形式和结构非常新颖、别致，具有很强的创新性，全书分为五辑：文艺大师：这个学霸不简单；生活大咖：

被耽误的美食博主；技术大拿：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；知行大德：人生名利皆为梦；率真大士：千帆过尽自从容。

在每一辑中，又写6个“之趣”即6章，来描写苏东坡的多件人生秘闻、趣事。如在“辑三”中，就从“科举之趣，水利之趣，躬耕之趣，断案之趣，医疗之趣，创造之趣”6个角度，深入书写了苏东坡的种种主动作为和建立的功绩。

全书以30个“之趣”一线贯穿，环绕立体般新鲜而又活泼，“新变”而又有趣，仰视而又俯瞰，横看而又侧观，平面而又多层次、多手法，描绘了苏东坡多重美好的襟怀、才艺和举止。写出一个既有厚重历史感，又有鲜活时代感的新的苏东坡形象。读罢全书，让人感到苏东坡可爱可亲、可叹可近、可信可敬。

该书形式别致，内容脱俗。描写苏东坡，于诗词中见精神，于仕途中见风骨，于吟哦中见才学，于落寞中见耿硬，于困厄中见豁达，于命运中见人性。写出一个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“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苏东坡，给人无穷的阅读乐趣。

煮雪烹茶

藩篱中不会有真知灼见

胡成江

解。他在《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》一文中说，诗不能翻译，要了解西方诗，至少须精通一种西方语言。据我所知道的，精通一国语言而到真正能欣赏它的诗的程度，很需要若干年的刻苦。许多青年诗人或是没有这种机会，或是没有这种坚强的意志。五四时代作家和他们引的引徒，勇于改革和尝试的精神固然值得敬佩，但是事实是事实，他们想学西方诗，而对于西方诗根本没有深入的了解；他们想推翻旧传统，而旧传统桎梏他们还很坚强。他们是白话写旧诗，用新瓶装旧酒。他们处于过度时代，一切都在草创，我们也毋庸苛求，不过我们要明白那种诗没有多大前途，学它很容易误事。他们的致命伤是没有在情趣上开辟新境，没有学到一种崭新的观察人生世相的方法，只在搬弄一些平凡的情感，空洞的议论，虽是白话而仍很陈腐的辞藻。

孟实先生不愧为我国著名的美学家、文艺理论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，饱食中国传统文化，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。从诗的起源说起，或“表现”内在的情感，或“再现”外来的印象，或纯以艺术形象产生快感，都是以人类天性为基础。所以，严格地说，诗的起源当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。

先生又写到“诗与散文”“诗与乐”“诗与画”，在“诗的境界”一节，引入“意象”与“情趣”要素。先生说，每个诗的境界都必须有“情趣”和“意象”两个要素。“情趣”简称“情”，“意象”即是“景”。吾人时时在情趣里过活，却很少能将情趣化为诗，因为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，如果不附



读朱光潜《诗论》，为其深邃与广博所折服。朱自清说，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，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。这种“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”，值得深思，文艺理论偏居一隅，是不会有真知灼见的。

孟实先生将中国诗置于世界视阈，纵观中外古今，不卑不亢，客观、理性、全面地论述。先生对中国诗歌史了如指掌，如数家珍，对中国诗何以走上“律”的路，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，“中文诗用韵以显出节奏，是中国文字的特殊构造所使然”。先生说，西方艺术也素来重视对称，没走上排偶的路，是由于文字的性质不同。西文单音节与复音字相错杂，意象尽管对称而词句却参差不齐，不易对称。艺术的技巧，都是由自然变成人为的。

孟实先生的观点，源自他对西文的深度了